

周恩来抱病陪同法国总统首次中国之旅

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3日至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,这是他任内第四次访华。法国总统访问中国历史悠久。早在1973年9月,法国总统乔治·蓬皮杜应邀正式访华,这是法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华,有力推动了中法关系发展。期间,周恩来总理抱病陪同蓬皮杜专程前往大同参观云冈石窟,并对云冈石窟的保护与修缮作出明确指示。

法国总统首次中国之旅 缘何首选云冈

外国元首访华多选择长城、故宫等景点,而蓬皮杜却首选塞北重镇大同云冈石窟。云冈石窟始建于1500多年前,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、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。蓬皮杜夫妇从保尔·克洛岱尔的诗集《认识东方》中认识中国,对中国产生向往,云冈石窟在他心目中是极具世界性、颇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宝。蓬皮杜于是慕名而来。

1973年9月11日,蓬皮杜一行飞抵北京,周恩来亲自主持接待工作。14日,双方签署中法两国联合公报后,周恩来全程陪同蓬皮杜先后到大同、杭州和上海参观。当晚,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一行夜间乘坐

火车奔赴大同。途中,周恩来接到北京相关部门电话,询问他饭后身体状况。原来,招待会上食物从法国运来,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饭后出现拉肚子反应。周恩来一切安好,他立即要求了解专列上其他同志情况,确认无人不适后,风趣地说:“看来喝酒还是有好处的呀。”又补充“不要鼓励大家喝酒啊”。随后,他感慨此次能参观云冈石窟得益于蓬皮杜总统的选择。

蓬皮杜的赞叹与周总理的关怀

9月15日上午,周恩来陪同蓬皮杜来到云冈石窟,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和讲解员李治国陪同。当看到大面积石雕被自然风化、渗水侵蚀,佛像色彩剥落、基石风化、缺手少足时,周恩来十分惋惜,马上询问防止石雕风化水蚀的技术问题和保护情

况。得知有10年修缮计划但未开始修缮后,周恩来陷入沉思。

参观过程中,记者围住周恩来,他耐心答问。蓬皮杜虽因患癌行动迟缓,却细致参观,不时询问石窟的历史沿革和保护情况。步入第5窟时,他指着17米高的摩天大佛赞颂:“是世界艺术的一座高峰。”参观时蓬皮杜不止一次赞叹:“真伟大,真了不起!”当看到三世佛雕像时,蓬皮杜禁不住对周恩来说:“世界最美的微笑在云冈!”

参观结束后,一行人来到接待室休息。周恩来询问云冈石窟修复情况,王冶秋称全面修复按计划需10年,周恩来坚定地说:“不行,3年搞好。”他还反复强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,还谈到南北朝历史和敦煌、龙门的雕塑艺术以及文字

改革等问题。

休息片刻后,周恩来对法国记者说:“感谢总统把我带到这里,这是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。”面对法国记者提问,他用法语幽默地说道,他因工作忙,以前从没来过云冈石窟。随后,他向24个国家的百余名中外记者宣布:“云冈石窟艺术一定要保护下来,3年搞好,3年后请你们再来参观!”话音刚落,记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周恩来的指示鼓舞着全国文物战线工作者。中央、省、市有关部门组成云冈石窟维修工程领导组并很快实施。从1974年到1976年,国家对云冈石窟实施“三年保护工程”。1976年9月,石窟维修工程如期完成,云冈石窟面貌焕然一新。(摘自《老年生活报》12.8 孟红、张俊满/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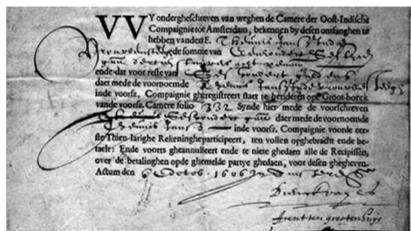
浪潮的推进,股票市场逐渐跨越国界。技术不断进步,经济持续发展,股票市场随之繁荣。然而,人性的贪婪也随之放大,催生市场泡沫,危机也悄然到来。

20世纪初期的美国,化工材料、化妆品、无线电等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相关公司的股票价格快速飙升。例如,美国无线电公司在1925年至1929年间股价上涨了939%。

1929年,美国股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,投资者情绪高涨。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,当时在美国声名鹊起的经济学家欧文·费雪公开表示:“股价已经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高原。”他本人也亲自下场,大手笔投资美国股市。

不过几天后,美股大崩盘就正式拉开帷幕,市场进入恐慌性崩溃阶段,绝大部分企业的股价断崖式下跌,投资者的财富灰飞烟灭。欧文·费雪一度坚持认为市场只是暂时回调,并不断加仓补仓,试图“抄底”。然而,随着市场持续暴跌,他不仅损失了全部积蓄,还陷入巨额债务困境。

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2025年第11期 周军/文)



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

路作为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,成了贯穿整个时代的大动脉。美国、英国等国的铁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建设铁路网、车站和运输系统成为这些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。

修铁路需要大量资金,单靠私人投资远远不够。于是,股票再次登场,成为推动铁路建设的关键工具。铁路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,迅速筹集到巨额资金,修建铁路网。比如,英国的大西部铁路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资,把铁路从伦敦铺设到了布里斯托尔。美国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更是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,通过发行股票筹措资金修筑铁路、购买列车,将美国东海岸与中西部贯通起来。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把手里的钱换成了铁路公司的股票。

进入20世纪,随着全球化

被神化的宋朝GDP

关于宋朝的GDP,中文世界流行着许多说法。

最常见的是两种。一种称宋朝的GDP占到了世界的80%,另一种称占到了世界的60%以上。某些“稍微严谨一点”的文章和著作,则将二者结合起来,说占到了世界的60%—80%。

这两个数据都不可信。“占世界的80%”之说,源头已不可考,也没有任何学术和史料依据。它的广泛传播,与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一档谈宋史的节目有关。节目中,讲述人介绍了这个数据,且对其持肯定态度。

“占世界的60%以上”之说,则出自误读。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·麦迪森,在其著作《世界经济千年史》中,有一项用购买力换算得出的统计,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(正值中国的北宋时期),亚洲(不包括日本)的GDP规模是789亿国际元,整个世界的GDP规模是1168亿国际元,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7%左右。

虚岁的这一岁

没有人能记得自己是怎么发育,又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。但这十个月,妈妈无时无刻不在为你输送营养,为你吃苦遭罪,也为你开心欢乐。剧烈的妊娠反应,让她头晕乏力,食欲不振,恶心呕吐,但为了给你提供足够的营养,她一边呕吐一边强咽食物;因为你的人住和成长,她好看的腰身变形了,她的手脚浮肿了,她的肚皮出现难看的妊娠纹。

虚岁的这一岁,是妈妈单独陪伴你的一岁。自从感知到你的存在,她就永远地告别了女孩,不敢再蹦蹦跳跳,走路都变得小心翼翼,以免闪失了;你生病了,更是不敢随意吃药、打针,任何一种药物,她都担心会损伤你,因而她总是选择用柔弱的身体与病毒硬扛;她变得爱自言自语,在没人的时候,悄悄地与你耳语,虽然她明知道你根本听不见;她更爱笑了,她的快乐、满足和骄傲,溢于言表;她喜欢听音乐了,也喜欢唱歌了,她唱的歌,是只为你而唱,她让舒缓好听的音乐,从自己的血管里,流淌到你小小的心脏里。她经常抚摸自己的肚皮,曾经光滑有弹性的皮肤让她骄傲,现在,却被你撑得露出了青筋,

她一点也不会为此责怪你。她轻轻地摩挲着自己的肚皮,以最温柔的方式亲近你,抚慰你;就连睡觉,她都不敢随便翻身了,生怕会压着你。当你第一次伸展小胳膊,或者蹬了一脚,或者翻了个身,你的这次小小的悸动,让她惊喜不已,就像一年多后,你第一次牙牙学语,喊出的那声稚嫩的“妈妈”一样,令她无比激动、欣慰和自豪。

虚岁的这一岁,是妈妈最苦最难的一岁,也是妈妈最坚强的一岁;虚岁的这一岁,是我们漫长一生中,唯一与妈妈告别了女孩,不敢再蹦蹦跳跳,走路都变得小心翼翼,以免闪失了;你生病了,更是不敢随意吃药、打针,任何一种药物,她都担心会损伤你,因而她总是选择用柔弱的身体与病毒硬扛;她变得爱自言自语,在没人的时候,悄悄地与你耳语,虽然她明知道你根本听不见;她更爱笑了,她的快乐、满足和骄傲,溢于言表;她喜欢听音乐了,也喜欢唱歌了,她唱的歌,是只为你而唱,她让舒缓好听的音乐,从自己的血管里,流淌到你小小的心脏里。她经常抚摸自己的肚皮,曾经光滑有弹性的皮肤让她骄傲,现在,却被你撑得露出了青筋,

你怎么能忽略这一岁?你怎么能忘记这一岁?你怎么能不将人生之初的这珍贵一岁,计入你生命的长河中?

说是虚岁,其实它恰是我们生命的周岁。虚岁是我们生命的真实起点,也是母爱的源头。永远不忘虚岁这一岁,你才会真正懂得母爱,懂得感恩,懂得回馈。

虚岁这一岁,也是我们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岁。

(摘自《读者》2025年第24期 孙道荣/文)

要花钱,老百姓承受的负担,“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”,与前代相比,重出了许多。

两宋三百年,这种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。宋仁宗时代,包拯在奏折里说:天下的纳税户口没怎么变,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加了一倍有余,这是为什么?是因为这些年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,就开始玩“折变”,玩“重率暴敛”,也就是变相增税。他问宋仁宗:“日甚一日,何穷之有?”这样一天天地增税增下去,何时是个尽头呢?

包拯说的,主要是农业税。增税的核心动力,是养活庞大的禁军与官吏集团。北宋禁军的数量,在宋太祖时代已有37.8万余人,到宋仁宗时代,则高达125万余人(包括部分地方厢军),同时代的欧阳修发出过“七八十万之兵,不得七八万人之用”的感慨。至于官吏数量,仅1001年就裁减了19.5万冗吏;而未被裁减者的数量,又远远多于裁减者。为了养活这近两百万人,北宋的财政很早就入不敷出了,宋真宗天禧年间的收支核算是:天下总支出15085.01万贯,总收入是12675.52万贯,亏空了2400余万贯。

在这种状况下,宋朝之所以还能立国三百年,是因为它在商业上采取了与前代不同的政策,不但不再抑商,甚至还有了一些重商色彩。在宋代的多数时候,来自工商业的财政收入,超过了来自田亩的农业税赋。

其实,判断一个朝代的生存环境对民众是否友好,不必使用后世发明的GDP之类的概念,由传统的财税制度入手,也足以管中窥豹。

北宋开国,民众承受的税赋,其实是很高的。朱熹就说过,“祖宗创业之初”有很多事



1000年前后,北宋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,是要少于22.7%的。

此外,麦迪森还有一个关于“人均GDP”的数据对比。他通过购买力换算,得出结论:公元960年,也就是北宋立国之时,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1990年的450美元,比同期的欧洲略高而已。遗憾的是,麦迪森的这个数据,很少被中文知识界引用。传播最广泛的说法,是毫无依据的“北宋人均GDP达到了2280美元”。

麦迪森的上述统计,是在数据非常不充分的条件下,做出的一种学术估计,而非精确计算。也有很多学者不认同麦迪森的数据,但这些不认同,并不会从22.7%偏差至60%乃至80%。

其实,判断一个朝代的生存环境对民众是否友好,不必使用后世发明的GDP之类的概念,由传统的财税制度入手,也足以管中窥豹。

北宋开国,民众承受的税赋,其实是很高的。朱熹就说过,“祖宗创业之初”有很多事

蛋挞效应”,指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,由于某个行业忽然爆火或兴起,很多同类型的公司纷纷跟风入场,然而由于他们只是简单复制、模仿,产品缺乏特色和竞争力,不久就迅速地迎来“倒闭潮”或“衰退潮”。

这就是蛋挞设下的甜蜜陷阱。人人都以为可以追上浪头,轻松地学习某个产业或技术,并从中获利,却忽略了市场实际的需求。

在生活里,蛋挞就好像人人趋之若鶩的流量,它拥有诱人的金黄色外表和浓郁的香气,可以轻而易举地吸引许多人。然而,当你仅凭一知半解的冲动敲开它坚硬酥脆的外壳时,就会发现里面的蛋液如此柔嫩,一旦缺乏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撑,它就会破碎、流淌,无法成形。

(摘自《知识窗》欧阳晨煜/文)